

第 六 輯

江西文史資料選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6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 六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一年九月

目 录

- 辛亥革命的一次大演习
——萍、浏、醴起义……………刘义胜、刘善之（1）
- 孙中山先生东江石滩平叛侧记……………马步英（11）
- 我是怎样参加辛亥革命的……………蔡蕙遗作（15）
- 亲切的教诲，难忘的记忆……………王秋心（26）
- 回忆对孙中山先生的欢迎与哀悼……………周兰清（29）
- 重温孙中山先生的一次讲演……………廖超伦（32）
- 亲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陈铭鼎（35）
- 辛亥革命见闻点滴……………武惕予（38）
- 七十年前永平秋操杂记……………徐雄士（41）
- 辛亥革命江西大事记……………王咨巨辑（47）
- 回忆大革命时期担任党的机要交通片断……………方志纯（64）
- 中央苏区邮政的历史概况……………赖绍尧（69）
- 一次成功的兵运——宁都起义……………谭志刚（79）
- 宁都起义中的学兵连……………曹光裕（85）
- 扫清白点破会昌……………王耀南（91）
- 长征路上散记……………温德泽（95）

淫雨霏霏出走大别山 孙国英 (107)

回忆白区地下斗争往事 王贤选 (114)

北伐战争在江西 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122)

红心向党，走向光明

——回忆凌源起义 韩梅村 (153)

徐州解放见闻 张丕声 (165)

郭沫若的一篇佚文

——《李公伯农先生墓志序》 邵天柱 (176)

补白：蒋介石碰钉子 (25) 两个火车头的窍门 (34)

落魄的李承晚在重庆 (68) 如此“钢铁屏障” (90)

1911年江西都督府欢迎孙中山先生莅赣 (照片) (封二)

辛亥革命的一次大演习

——萍浏醴起义

刘义胜 刘善文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爆发于江西省的萍乡县、湖南省的浏阳县和醴陵县的萍浏醴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后，由同盟会会员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除广大农民及受压迫的阶层群众参加外，另一个特点是，史称六千安源工人参加了这次起义。这还是目前所见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大规模武装起义的最早记录。它同武昌起义以前各次重大起义一样，是辛亥革命的一次演习。

起义的酝酿和爆发

萍浏醴起义，从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四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十月十九日）在萍、浏、醴三县交界处的麻石爆发，至一九〇七年一月中旬，起义军余部在江西义宁（今修水）县境内被清军击溃而告最后失败，历时一个多月。

一九〇五年俄国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不仅推动了欧洲工人运动的高涨，而且唤起了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当俄国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进步报刊热烈同情和赞扬，并预言：“革命之风潮浸淫而及于东亚者，其期亦不远。”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连续刊载了有关俄国革命的消息和评论，号召中国人民“闻风而兴起，效法俄国人民起来革命。”

一九〇五年八月，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几个地方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领导人集会于日本东

京,组成了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同盟会,并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后,便把武装起义的问题提到首位,陆续派遣会员回国,从联络会党入手,发动和领导武装起义。

约在一九〇六年春,同盟会湖南籍会员,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受东京总部派遣,回到湖南,“运动军队,重整会党”,伺机发动武装起义。此时,在湖南有两件事直接促进了革命时机的成熟:第一件事是一九〇四年,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联络以马福益为首的哥老会,密谋在长沙起义,未至期而失败。次年,马福益被官府捕去杀害,激起了会党各级首领和会众的极大愤慨。第二件事是一九〇六年春夏之间发生特大水灾,湘江沿岸各县付之一洗,“数百里间,汪洋一片,茫无涯际,死者三、四万,浮尸蔽江,被灾者三、四十万人,皆冻馁交侵,四乡乞食。此次奇灾,为湘省二百年所未有。”随之而来的是农村普遍歉收,粮价昂贵,一日数涨。官绅豪劣乘机横征暴敛,奸商囤积居奇,高抬市价。民不聊生,群情激愤。

刘道一、蔡绍南回到湖南看到这种情况,便加紧活动。他们当时认为,这次革命是国民革命,而非古代的英雄革命。革命的目的是求得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非个人争王争帝。因此,要使会党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必须洗刷他们的头脑,健全他们的思想。他们对于这次革命的性质和目的的清醒认识,无疑地对发动这次武装起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刘道一等在长沙召集革命党人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详细讨论了起义力量的组织,制订军事计划,包括进攻的目标,起义的地点和时间等,并对起义的准备工作做了比较周密的部署。确定组织会党万人首先起义于萍、浏、醴,并运动军队反戈支持起义,直攻长沙,同时争取各省革命志士响应,以期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并确定在当年阴历十二月清吏封印(每年阴历十二月十九日、二十、

二十一日三日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吉时，颁示各级官署，一律封印，封印之后不再签押视事。封印时间为一个月，至明年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内择日开印，照常视事。）之期举事。

会后，刘一道留驻长沙，掌握全盘，并负责与同盟会东京总部联络；蔡绍南则前往江西萍乡一带，负责发动萍浏醴会党。

当时，萍浏醴一带是会党集中的地方。萍乡的安源煤矿有工人三、四千人，萍乡县境内尚有官办和商办煤矿十多处，也有不少工人。株萍铁路也有上千工人。这些工人多数来自附近各省各县的破产农民，他们同农民有密切的联系。醴陵向以陶瓷业著名。因此，这里除一部分株萍铁路工人外，尚有众多陶瓷工人。浏阳和萍乡上栗市一带，则以鞭炮业著名，集中了许多从事鞭炮业的手工工人。他们熟悉制炸药的技术，并拥有制造鞭炮的土硝，这对于制造起义所需土枪土炮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萍浏醴一带多山，便于隐蔽，人员来自四面八方而又集中，便于会党活动，所以会党在这一带拥有雄厚的势力。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一九〇四年在长沙准备起义，正是以这批会党力量作为基础的。

这一带的会党当时大致有三派：即哥老会、武教师会和洪福会（亦称洪福齐天党），各大派中又有许多小派。哥老会首领马福益被杀害，以龚春台、李金奇、肖克昌、冯乃古等为首，各有会众数千人，主要活动于萍乡安源、醴陵、浏阳南部一带；武教师会以沈益古、廖淑保等为首，会众数百人，以萍乡上栗市一带为最多；洪福会以姜守旦为首，会众数千人，以浏阳为活动基础。

蔡绍南通过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的学生魏宗铨与会党联系。魏宗铨系萍乡县上栗市人，负责爱国革命思想，与武教师会首领廖叔保、沈益古等拜盟，并与哥老会首领龚春台有交往。为了便于进行革命活动，魏宗铨毅然退学回上栗市，以开设“全胜笔纸店”为掩护。蔡绍南则伪装富商，由魏介绍与龚春台等联络。这样，很快结识了萍、浏、醴一带会党首领。向各处会党首领和会众发表演说，反复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并力图使各派

会党联合起来，深得会党拥护，联络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经蔡、魏和各地首领商定，以魏宗铨替祖先做冥寿为名，在距上栗市二十里的慧历寺请道士焚香三天，以此为掩护，召集萍、浏、醴各地会党首领开会，商义武装起义问题，并决定将哥老会和武教师会联合为“六龙山洪江会”（洪福会大约因为在政治观点上有根本分歧，故未参与联合），举行开山大典，公推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总机关设在萍、浏、醴三县交界处的麻石。会后，各路码头官分赴各地，开堂散票，发展组织。在他们的宣传和发动下，贫苦农民和工人群众纷纷加入洪江会，洪江会组织迅速发展到了萍乡、浏阳、宜春、万载、醴陵各县，队伍迅速壮大起来。

为了进一步作好起义的具体准备，一九〇六年七月间，龚春台、蔡绍南等召集各路首领在萍乡大岭下一座寺庙里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了武器、火药的筹集，争取未加入洪江会的哥老会其他头目和洪福会加入洪江会等问题。决定派蔡绍南、魏宗铨前往上海、香港、广东等地联络各地革命机关，共同起义，并东渡日本向同盟会总部报告组织经过，要求给予军械支援，请示起义日期。

各地会党的频繁活动，引起了官厅和地方豪绅的注意。他们四出刺探会党活动情况，图谋镇压。这年中秋节（阳历十月二日）前后，萍浏醴一带群众按照传统风俗在麻石酬神演戏，来往于麻石的人每天达万人以上，洪江会利用这一机会进行活动。不料三县官绅怀疑会党即将起义，派出巡防营袭击麻石。会党群众猝不及防，被清军冲散。原哥老会头目，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被追捕，逃至醴陵，陷入清军重围，10月7日被迫投白兔潭溺死。

此时，蔡绍南、魏宗铨两人已行至上海，正拟东渡日本与同盟会总部联络，突然听到麻石事变的消息，立即赶回。召集各路首领会议，讨论对策。会议仍然订在年底清吏封印时起义，兵分三路：一路以萍乡安源为根据地，一路由浏阳、醴陵以进窥长

沙，一路由宜春万载东出瑞州（今高安县）、南昌，以攻占苏皖。会后，各路首领便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

麻石事变后，清官府加紧对会党的防范和缉捕。十月二十一日，在安源工人中享有很高威信的会党头目张折卿在醴陵被捕杀害。不久，萍乡会党在萍实里聚会，被官府发觉，搜去名片和会党名单。浏阳、醴陵等地会党组织也不时遭到清吏袭击，一些会党头目如王永求、罗良初等被捕被杀，斗争形势日趋紧张。

针对这种情况，十二月三日，龚春台、蔡绍南等又召集各路首领在上栗市附近的高家台举行特别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洪江会各地会众、矿工、流亡僧人以及农民群众闻讯纷纷赶到，一时聚集了許多人，等待紧急会议的结果。

在会上，对起义的时间问题发生争执。龚春台、魏宗铨等认为现时军械不足，与在长沙的刘道一又失去联系，因此他们主张目前暂缓行动，待同盟会总部接济来到之后，再行起义。而原教师会首领廖叔保和众多码头官则认为现在会党人数众多，联合各地党友不下十余万人。他们主张趁官兵未到，即时起义。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直至天明，仍无结果。

可是，各路会众愈集愈多，群情激愤，意见纷纭，秩序混乱。廖叔保不愿起义再拖宕，便在次日拂晓当会议正在争执不休时，独自带领一批激进分子跑到麻石，召集二、三千人，树起“汉”字白旗，宣布起义。

龚春台、蔡绍南、魏宗铨等见事已成骑虎之势，不容再迟缓，遂决定放弃己见，以洪江会总机关名义檄知浏东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和普迹市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并飭知各县会党同时发动。就这样，酝酿已久的萍浏醴起义，比原定计划提前一个多月，于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四日全面爆发了。

起义的经过和影响

起义爆发后，洪江会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

锋队”，公推龚春台为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习，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都粮司，廖淑保为前营统带兼急先锋，沈益古为后营统带兼殿后指挥。起义军当即以“奉中华民国政府命令”的名义，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历数清朝政府腐败卖国的种种罪行，明白宣布起义军的宗旨，“破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国”，“使地权与民平均”。檄文并宣布了各项内外政策和起义军纪律，号召：“凡我同胞，急宜端力以扫除腥膻，建立乐国。”

当天，起义军便大举向浏阳高家头、萍乡上栗市进攻。义军以大号筒数对、“汉”字大白旗一面为前导，队伍中尚有白纸小旗无数，上书“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等字样，所持武器主要是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甚至还有木竿、锄头、菜刀等。

麻石发难消息传出，各路会党纷纷响应。

浏阳县南部有洪江会众数千人，高举“汉”字义旗，响应龚春台部，宣布起义。

浏阳县东部和北部的洪福会众数千人，在首领姜守旦率领下也立即响应，宣布起义，向浏阳县城进攻。同时，派人到上栗市与洪江会义军联络，表示愿意与洪江会实行军事上的合作，自称“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旗号为“洪福齐天”，并发布《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历数清王朝的罪状，号召“檄到之地，我同胞其投袂而起，共复中原，用成我新中华大帝国。”

醴陵县参加起义的洪江会众除一部分农民外，还有众多陶瓷业工人和部分巡防营士兵。起义军分西、东、北三路，西路为主力，东路为前军，北路为后军。西路总统为李香阁，直接统率一千余人，下分左右两军及水军，各有群众三千人。东路首领为瞿光文，称前军总统；北路首领为谭石基，称后军统领，各有群众数千人。12月6日，东路瞿光文部奉调往龚春台部，西路李香阁和北路谭石基部进攻醴陵县城。

萍乡县安源本来是起义军计划中的根据地。有会众六千人，其中多为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由于安源产业重要，又有德国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在此，因而一向有清军守护。起义爆发后，官军又增兵防范。十二月七日，奉命去安源与肖克昌联络的醴陵会党头目袁兰亭被捕，使醴陵与安源之间联系断绝。随后，肖克昌在安源附近小冲率众起义，很快被打败，肖克昌本人又与安源隔绝。十二月二十四日，肖克昌被清军诱杀，群龙无首，致使安源工人未能发挥战斗作用，整个起义丧失了一支巨大的战斗力量。

除安源工人外，在萍乡方面洪江会还有不少农民和十几个官办、商办煤矿的工人以及上栗、桐木一带的手工业工人。当龚春台部在麻石发难和攻占上栗市、桐木一带时，当地会党群众即踊跃参加，安源周围及宣风、芦溪等处煤矿工人也纷纷奔赴前线，参加战斗，“矿井辞工者每日以百数计”。

此外，宜春、万载两县也有一部分会党群众响应起义，但因缺乏坚强的首领指挥，起义后不久即溃散。

以上几个地区，在麻石发难后，先后投入起义战斗的共约三万人，从而使义军迅速控制了江西省的萍乡、宜春、万载和湖南省的浏阳、醴陵等五个县的广大农村地区，其先头部队竟到达湘潭县境。

轰轰烈烈的起义，在国内和国外影响极大。国内一些报刊开辟新闻专栏逐日报导所谓“萍乡乱耗”、“萍匪乱事”。外国报纸也纷纷报导起义消息。日本的报纸还发行号外，逐日报道和评论。

起义消息传出，各地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极为振奋。消息传到日本，旅日同盟会会员也纷纷向总部请求回国参加战斗。孙中山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形时写道：“丙午萍醴之役，则同盟会会员自动之师也。当萍醴革命军与清兵苦战之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线，与虏拚命，每

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孙中山连日同会员商讨支持萍醴革命军的办法，派宁调元、谭人凤专往萍乡、醴陵联络，并派朱子龙、胡瑛、梁钟汉等回国组织起义响应萍醴革命军。武昌新军中的日知会领袖刘静庵、张难先等得到萍醴革命军通报后，立即召集会议，密谋响应。在浙江，著名女革命家秋瑾也积极准备行动，以与萍浏醴革命军相呼应。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清朝政府则惊恐万状。两江总督端方、江西巡抚吴熏熹向清廷奏道：“该匪初起，势甚猖獗，所到之处，胁民为匪，云集响应；未到之处，谣言四布，人心惶惶。”一时间，“官私各电，报告匪警者络绎不绝。”湘赣两省巡抚请求清廷增兵镇压，汉阳铁厂督办盛宣怀，安源煤矿总办林志熙等，则向湘赣两省巡抚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方等呼救。清廷闻讯，立即调动湘、鄂、赣、苏四省军队五万余人，其中有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等等，向萍浏醴地区包抄，实行血腥镇压。

帝国主义者感到“此次事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一次地方性的骚乱”，“比一般无关紧要的骚乱要可怕得多。”因此，英、美、俄、法、德五个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出动各类军舰二十多艘，分别驶往岳州、汉口、宜昌、九江、上海等地，游弋长江和湘江，观察动静，张剑拔弩，准备随时向中国人民动刀。

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起义者毫不畏缩，他们英勇奋战直到最后一个人。起义的战斗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十二月四日到十二日，这是起义军的进攻阶段。起义初期，当地虽有相当数量的清军，但终究敌不过人数众多，满腔愤怒的起义军；后来清廷虽然陆续增调了大批军队，但所调军队到达有先后，刚到之时，阵脚未稳。因此，这几天中起义军能到处进攻，所向披靡，多次大败官军。例如，十二月八日，江西巡抚派往萍乡的两队步兵，在距离萍乡县城“二十五英里”处，即为起义军所败。十二月十日，萍乡消息：除江西巡抚

派兵外，湖南巡抚亦派兵三中队，但乱党在安罗地方大败官兵。”同日南昌消息：萍乡“巡防军竭力堵剿，该匪党与接仗，官军大败溃散。”当时，官方舆论认为“江西兵不力，若非武昌及南京派兵援助，难望平定。”但武昌方面派来的鄂军初到之时也“未能得手”；“助剿萍匪之鄂军头队方到萍乡，尚未憩息，匪即来攻，以致小有不利云云。”官方报纸埋怨“政府剿办之兵甚不得力”，惊呼这里“电报已断绝”，那里“大受惊慌”，活画出官军一败涂地，朝野惊恐的狼狈相。在起义军的猛烈打击下，官军士气低落到如此程度，以致大批士兵持械逃散，军官吓得痛哭流涕。上海《时报》1906年12月24日报道：“初一、二日（按：阳历12月15、16日）湖南消息云：……前日开往醴陵之常备军百人行至中途，大平均携军械逃去。现在俞绶函观察闻此电报，痛哭不止云。……二十五日（即12月8日）上午醴陵来电，常备军与土匪略战便败。前派赴浏阳截堵之兵亦逃散。现正派一标一营一哨赴战。闻常备军某标标统吴武员现住贡院后街，闻战败之后，在家哭而不去。”这些消息报导，今天读来，仍感大快人心。

但是，起义军终究在装备和训练方面远不如官军。而且由于起事仓促，各股蜂起，号令不一，外界也一时接应不上。仅凭义愤和勇敢，孤军奋战，自然难以持久。十二月十日，驻守上栗市的起义军五、六百人被敌军突袭围困，虽奋勇迎战，坚持半月，但伤亡重大。后军统带沈益古一手执锅盖，一手提大刀，力战群敌，连杀清兵十余人，使敌军心惊胆战，但终以势孤力竭，壮烈牺牲。于是上栗市陷落。十二日，起义军同时在醴陵和浏阳两个战场上失利，死伤惨重，军事首领多人战死。从此，起义开始衰落。

第二个阶段，从十二月十三日到二十日，是起义军同官军之间的相持阶段。

十二月十二日义军在醴陵、浏阳失利后，队伍被打散，分割

于萍、浏、醴各处，而主要战场在浏阳。在清军处处设防，多方堵截的困苦环境下，魏宗铨、廖淑保等率领洪江会起义军各部，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灵活战术，与敌军周旋，顽强战斗四十余次，消灭清军不少，义军本身损失也很大。最后义军在上栗市遭到原与同盟会有联系的江苏新军统制徐绍桢背叛性的围杀，廖淑保等首领及会众一千余人壮烈牺牲，仅魏宗铨带少数人逃出，不久也被杀害。姜守旦所部洪福会起义军，在浏阳县境内也曾与清军作战多次。十二月二十日，在平江县境内与清军大战，起义军败散。姜守旦率余部退入江西义宁（今修水）县境内。此后，起义只剩了余波。

第三个阶段，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〇七年一月中旬，这是起义军战斗的尾声。十二月二十日战败的姜守旦余部退入江西义宁县后，到一九〇七年一月十四日被清军击败，全军复没，姜守旦下落不明。至此，轰轰烈烈的萍浏醴起义最后失败。

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国内却严重打击和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鼓舞了人民；在国外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反映了中国人民不可辱，中华民族不可欺的高尚气质。

孙中山先生东江石滩平叛侧记

马步英

半个多世纪前，我还在青年时代，有幸在广东参加当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亲眼得见孙先生在那烽烟弥漫、枪林弹雨中泰然自若的大无畏革命气概。往事至今历历在目，令人永远难忘。

那是一九二三年夏天，我才二十三岁，从南昌动身到广东去，经九江乘轮船到上海。夜宿于上海打狗桥的“同义和”公寓。这是一家半公开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对外也称老板，我们叫他甘老头子。由他代我们四人买船票去广州。第二天清早，我乘英商太古轮经香港到达广州。这时，陈炯明的叛军正在惠州兴风作浪，并勾结北洋军阀吴佩孚，派豫军樊钟秀部准备南来夹攻。他们乘中山先生不备之际，阴谋策划叛变革命，广州形势顿时处于紧急状态。

中山先生在这此严重关头，派革命军（滇军）杨希闵部讨伐叛军，调遣范石生、蒋光亮、朱培德、李根源等部开赴前线。孙先生并亲临前线指挥战斗。陈炯明见势紧张，又将林虎、洪兆麟、叶举三支部队调回东江一线，从惠州直扑飞鹅岭。叛军来势凶凶，革命军招架不住。一时几乎面临弹尽粮绝困境，广州形势更趋紧张。

为了组织革命力量平定叛乱，中山先生返回广州筹足粮饷之后，立即同参谋长李烈钧一道，乘火车重返前线督战。杨希闵部与叛军激战于石龙一线。这时叛军非常嚣张，飞鹅岭已被他们所

占。杨希闵部一时难于取胜，情况已是十分危急，石龙进不去了。中山先生乘坐的那列运粮饷的火车只能开到石滩。这时前线节节败退，李烈钧等极力劝说孙先生暂返广州，于是中山先生乘原车向广州方向开去。同车的有李烈钧，鲍罗廷，记得还有一个面相很象中山先生的，别人告诉我，那是孙科。这列车挂有五、六节车厢，载着一部分还没有发放的粮饷和其它军需物资。孙先生坐在一节堆满了军需物资的车厢里。

当时，我是在滇军杨希闵部的宪兵司令部工作。担任第三分队队长。我们来了一个中队，约八、九十人，是奉命到石滩督战的。我的具体任务是护送中山先生，监视火车的机车，防止出现不测事故，确保中山先生的安全。那时我年轻力壮，坐在火车头上煤炭堆里。因为流弹还在不时呼啸而过，随时有被流弹射伤的危险。我便在煤堆上掀开一个窝窝，作为掩体。我坐在这个掩体里极目盯住前方，火车快速向前疾驶。

列车由石滩开出，过了一个小站，枪炮声仍然时断时续。车站近旁有一小桥，为了防备小桥被炮轰断，必须争取先将车身开过桥去。如果小桥被破坏，火车就开不过去了。可是火车刚一过桥，机车就因缺水卡住不能前进了。司机长发现这一情况，只得停车加水。面临着这突然发生的情况，怎不叫大家焦急。我持枪站在机车上瞭望，严密警戒四方。这时我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走下车来，他神情镇定，缓步走近站台。我仔细一看，只见他头上戴着一顶奇怪的帽子，前后有飘带似的帽沿。嘴上还蓄着两撇八字胡子，那黑黑的胡子向上翘着。他是站在站台边观察动静，查问况情。恰好旁边有两只小狗在奔跳戏耍，他看得似乎很有兴趣。我走下了车问一下他身旁的一位护兵，方知此人便是参谋长李烈钧。我又问：他为什么戴那么一顶怪帽子呢？原来这时李烈钧正患有脑髓炎症，为了防止风吹，所以戴了那么一顶防风帽。

枪声还是不绝于耳，子弹越打越密。陈炯明的叛军离这里已

不远了，而且正在疯狂地追击我们。后撤的部队又络绎不绝而来，形势是非常紧张的。现在火车机车缺水，而附近水源又困难，好不容易把站台附近所有水缸里的水都提上机车，蒸汽机的牵引力还是不能带动整个列车行驶。怎么办呢？于是决定将机车后面挂的几节车厢甩下，单开火车头走，以减轻机车的负担。

就在这时，我看见孙中山先生走下车来。他是准备乘坐火车头的。我感到非常幸运，心里想：今天我要仔细看看这位伟大人物。我看得出，在那败退下来的十分危险时刻，孙先生内心确也有些焦急；但外表却极为安详。他头戴一顶浅灰色的拿破仑帽，身穿西装；目光炯炯有神，四面环视。他蓄有两撇胡子，胡子花麻两边分，约莫五十岁上下。右手拿着一根手杖，左手还夹着一叠文件，缓步走上机车。当时孙先生英姿飒爽，出入于枪林弹雨中，那种临危不惧的英勇气概，不由得使我肃然起敬。

但是机车上并没有坐位，孙先生上车后便坐在我原来坐的那个煤炭窝式的掩体里。机车在枪声轰隆中飞驶，孙先生始终神态自若。

机车行驶了一段路程，只见由广州方向迎面开来一列火车。两列对开的火车便同时缓缓靠拢。我看见那列车上装的士兵几乎全是持梭标的。心里猜想：前线更紧张了，这必定是去打白刃战的。等到两列火车都已停下，我才明白他们是奉命来增援的滇军。于是李烈钧走下机车，率领这支增援部队急向石滩前进；我随中山先生也走下机车，改乘那辆迎面来的列车倒回广州。孙先生上来之后，我就坐入另一节车厢。

原来李烈钧率领增援的滇军继续上火线，还是没有取胜。叛军攻破观音山，直逼广州市郊的白云山下，子弹已经落到广州市区了。广州江防司令杨天培，吓得慌了手脚，仓皇逃往香港。平定叛乱以后，杨天培返回广州，革命人民依法处决了这个临阵脱逃的怕死鬼。孙先生乘坐的那辆火车直奔广州时，叛军就在后面边打边追，情况更是万分紧张，广州的军政机关也准备撤退到北江。